

#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

姚金海<sup>1,2</sup>

(1.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江西南昌 330108; 2. 江西财经大学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西南昌 330013)

**摘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了一套科学系统、逻辑严密的思想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构建了“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逻辑链路,从理论上清晰地回答了“是什么”的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了“七个坚持”的主要内涵,从实践路径维度辩证地、科学地回答了“怎么办”的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有机结合的基础上,实现了战略与战术、任务与方法、动机与效果的辩证统一。

**关键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发展理念;现代化经济体系;高质量发展;“七个坚持”

中图分类号:D616;F09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18)06-0001-08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团结带领各族人民群众进行了全方位开创性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在成功驾驭中国经济发展大局的伟大实践中总结提炼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理论结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构建了“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样一条逻辑链路,从理论上清晰地回答了“是什么”的问题。这一具有严密逻辑和科学系统的经济思想也进一步明确了“七个坚持”的主要内涵,从实践路径的维度辩证科学地回答了“怎么办”的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有机结合的基础上,实现了战略与战术、任务与方法、动机与效果的辩证统一。在新时代谱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协奏曲中,这一经济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标定的新历史方位下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既提供了认知层面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也提供了实践层面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高质量发展为根本要求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做出了“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判断<sup>[1]</sup>。从党的十八大“切实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sup>[2]</sup>,到《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sup>[3]</sup>,再到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做出的“从生产端入手,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sup>[4]</sup>系列重要论述,无不表明习总书记对质量的重视由来已久。习总书记不仅重视经济结构、发展效率和动力等宏观质量问题,同时也关注消费品质量、食品农产品质量、环境质量等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微观质量问题。相对于依靠要素和投资驱动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高质量发展是更加科学的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学视角下的质量指的是产品满足实际需要的使用价值特性,高质量发展则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使用价值特性的发展模式<sup>[5]</sup>。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时代

收稿日期:2018-02-2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6BKS049);江西省交通运输厅重点项目(2017C0006)

作者简介:姚金海(1979—),男,江西萍乡人,副教授,博士后,从事公共经济管理研究。

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sup>[6]</sup>。新时代历史方位下,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给我们出了高质量发展这道考题,如何在经济发展面临三期叠加的新常态中答好这道考题是一个艰巨的挑战。最终,这道题答得好不好需要人民根据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程度来给出评价。高质量发展既包含必要的经济增长,也包含“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更加丰富的内涵和更加广阔的外延,因而是一个量与质有机统一的概念。我们当然要反思并纠偏过去地方政府通过掠夺自然资源和破坏生态环境盲目追求经济增长的行为,但同时也应避免滑入“离开量的规定空谈质的发展”的另一个极端。政府每年的工作报告都会提出经济增长的合理目标区间,这是保就业、增收入、惠民生的必要保障。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唯物论和辩证法要求我们在系统性、稳定性和持续性的视野下,把握经济发展“速度、质量和效益”的统一,在“质量、效率、动力”三大变革中实现“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三大关口的跨越。中国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一场深刻的质量变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需求不足或没有需求的情况在我国已基本不存在,问题主要是供给侧的产品或服务跟不上变化了的需求,导致质量或服务出现脱节或跟不上<sup>[7]</sup>。这就要求我们来一场真正的质量变革,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的“质量、安全、健康、价格和诚信”等消费领域集中的问题,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基于美好生活需要的消费升级需求,显著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优势。按照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国是全球唯一拥有41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完整工业体系的制造大国,但我们显然还不是制造强国,跟日本、德国等制造强国仍存在巨大差距。首先表现为低质量产品过剩和高质量产品不足的结构性问题。大量低价低质型企业甚至僵尸企业的存在,一方面占用了稀缺的经济金融资源;另一方面催生了恶性竞争,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失败,企业由此深陷“低质、低价、低利”的恶性循环难以自拔。其次,国际经验表明,GDP跨越人均八千美元大关之后,数量型消费向品质型消费的升级趋势明显。供给端产品质量“质劣价高”的问题不解决,企业高附加值产品区间的竞争压力将与日俱增,阵地将逐步萎缩。研究表明,2012年,中国在低、中、高附加值产品区间的竞争压力指数分别为23%、45%和70%;我国高质量产品在1995年到2010年的出口中所占比重最高也就只有36%左右<sup>[8]</sup>。长此以往,品质型消费者必然“用脚投票”,将手中的货币选票转投进口产品。到日本抢购马桶盖、电饭锅等日用

品看似奇闻,实则是中国制造“全而不优”“大而不强”等问题的缩影。此外,频频曝光的农药残留超标、抗生素滥用、瘦肉精、毒奶粉、假疫苗等事件所暴露出来的食品安全事件更是触及人民群众基本食品药品主权的底线问题。因此,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补足制度监管短板,实现商品和服务由“增产导向型”向“提质导向型”转变,在“质量强国”的建设中“扩大优质增量供给”,才是解决我国经济结构性供需矛盾的根本之道。

高质量发展需要立足自主研发和自主创新,坚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来一场实质性的效率变革。长期简单、粗放甚至野蛮的要素驱动模式要转变为创新驱动发展模式的蝶变不可能一蹴而就。其本质是一个凤凰涅槃的过程,这就决定了效率变革高质量发展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本质上是技术效率、资源配置效率和制度效率的综合竞争。这就要求我们通过加大研发投入提高技术效率,构建市场机制和现代金融体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深化“放管服”改革提高制度效率,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极大提升。高质量发展首先体现为生产的高效率,而全要素生产率则是衡量生产效率的核心指标,它主要源自研发投入增加、人力资本积累、经济开放度提升和金融发展、制度改革与完善等因素导致的技术进步、规模经济和效率改进。习总书记指出,科技成果转化成为生产力和创新驱动发展要经过科学研究、实验开发、推广应用这样一个三级跳的过程<sup>[9]</sup>。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研发投入稳步增长,2017年的研发经费总投入和投入强度分别为17500亿元和2.12%。从研发投入强度的角度分析可知,以色列、韩国、日本、美国等创新型国家的这一指标分别为4.25%、4.23%、3.49%、2.8%,我国与之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尤其是科研成果转化率低这一制约研发投入效益提升的瓶颈亟待破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性制度”,随着资源配置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金融市场扭曲、政府干预和国企垄断等问题在当前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仍然客观存在。现代金融体系,尤其是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的滞后,使得中国企业因资本错配造成的全要素生产率比美国低30%~50%<sup>[10]</sup>。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三梯队的中国与第一梯队的美国、第二梯队的欧盟和日本之间还有较大差距,我们的赶超至少要再努力数十年。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对于经济行为和经济发展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种影响取决于制度与外部环境之间的适应性也即“制

度效率”。制度效率往往通过资源配置效率体现出来,并与其呈正相关关系。制度效率高,会使得个人行为成本收益收敛于社会的成本收益,因而对国家或社会的不确定性及其交易费用有着直接影响<sup>[11]</sup>。作为全面深化改革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先手棋和当量炮的“放管服”改革,本质上是以权力“减法”和服务“加法”激发市场“乘法”,在资源配置中实现市场无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的有机结合,从而有效降低各类制度性交易成本,进一步提升制度效率。这一改革在过去数年取得了显著成绩,激发了市场活力,带动了创新创业热潮,促进了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但目前国务院部门行政许可和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许可还有1300多项,其中很多许可项目是不必要的。这说明“放管服”改革离人民群众的期盼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近期的舆情热点也表明,重审批、轻监管的制度和监管模式仍具有典型的官僚体制特征,制度效率亟待提升。

高质量发展同样要求动力方面进行一场持续彻底的变革。这就要求大力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高能耗、高污染、低水平企业进行全面整治与引导退出,通过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新兴产业做大做强来实现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变革要求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和技术驱动,由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拉动,由工业主导转向服务业主导,由总量发展导向转向绿色发展导向,由城乡二元发展转向城乡一体化发展。然而,我国当前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仍存在工业基础薄弱、资金投入不足、人才缺乏与体制不成熟等问题。以核心集成电路领域为例,服务器MPU芯片、FPGA、DSP等领域的芯片自给率基本为零,严重依赖国外供应商。高质量发展要求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虽然从中国经济增长三驾马车的比例关系上而言,消费已经超过投资和净出口成为主导性力量,但是由于税制不合理、收入差距过大、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房地产价格过高等原因,老百姓的消费能力被极大地压抑。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污染防治和乡村振兴任重道远等问题也仍是横亘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的重大障碍。

## 二、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迫切要求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无论是明确目标思路的理论建构,还是跨越发展关口的经济实践,都迫切要求我们答好“现代化经济体系”这道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只有在现代化经济体系中才能实现。现代化

经济体系建设应该把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我们应咬定制造业这个主战场不放松,以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实施为支点,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伟大飞跃。高质量发展要求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的结构合理平衡,但是,在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融资结构畸形发展和金融业利润过高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我国经济呈现出典型的“脱实向虚”特征。价格泡沫演化预期下的房地产在占用大量的土地等经济资源的同时,也挤占了有限的金融资源。影子银行、小贷公司、P2P等大量的金融伪创新,其资金来源最终还是银行,这就固化了银行主导的畸形融资结构,抑制了以多层次资本市场为代表的直接融资模式的发育成长。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实体企业厂房租金、融资成本、工资福利等生产和生活成本大大提升,收入分配差距因资产价格泡沫进一步拉大,实干兴邦和实业强国的社会心理被极大扭曲。上述问题的解决,亟待我们在推进以“三去一降一补”为主要内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推进经济转型升级,推动中国经济实现“虚实结合、良性互动、包容增长”的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现代化经济体系这篇大文章要出彩的话,在守住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这一主战场的基础上,我们应着力注入科技创新因素提质增效,引入现代金融活水降本增效,并发挥人力资源这一能动要素协同推进现代产业体系建设<sup>[12]</sup>。现代产业体系是特定区域特定时间内,各产业部门之间关系更加优化的新型产业体系,具有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低耗能、低污染、自主创新能力强特征<sup>[13]</sup>。习近平总书记对包括“基础技术、通用技术、非对称技术、‘杀手锏’技术、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在内的核心技术高度重视,但他深知突破核心技术不是光凭政府的一腔热情和单兵突进就能实现的,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必须抓产业体系建设,要从技术、产业、政策上共同发力<sup>[14]</sup>。在创新和技术驱动的高质量经济发展阶段,我国在科技体制方面的改革仍然相对滞后,在创新资源配置中政府和市场关系仍未理顺,在“技术研发导入、技术转让孵化、产业化市场化”的全产业链中仍有堵点和痛点,在技术创新进程仍然呈现典型的政府或高校而不是企业主导特征,在研发经费投入方面仍然不足,在融资支持方面仍然主要依赖银行信贷等间接融资模式。由此导致我国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聚焦突破不够,并致使中国制造在全球产业分工格局中长期滞留在价值链底端。有研究表明,我国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依然较弱,相对于美国、日本仅为5%左右

的技术依存度而言,我国目前该指标约为 50% 左右<sup>[15]</sup>。现代金融的初心和使命就是在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过程中有效服务实体经济,具体体现为“一条底线、三个目标”,也就是在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基础上有效实现“为实体经济提供低成本和便利融资、大力促进创业创新活动、以资本的力量促进龙头企业加速落地并引领产业集群发展”等三大目标。人力资源作为第一要素,是创新这个第一动力和高质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的智力支持和实践主体。人才红利是最大的发展红利,人才优势是最核心的竞争优势,国家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我们应该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人才的重要论述,在产业发展和招才引智中构建“引得进、留得住、过得好”的人才机制,真正做到“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求我们有效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现代产业体系的协同发展在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犹如中枢系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作为产业发展两大子系统必须实现辩证统一、融合发展。当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占 GDP 的比重大概为 10%,国家发改委预计该指标到 2020 年将达到 15% 左右。这一方面表明,未来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空间巨大,另一方面也告诉我们占比高达 80% 以上的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当前及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推动我国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主阵地。事实上,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具有相辅相成和良性互动的关系,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日臻成熟后将实现向传统产业的转化,而传统产业在经历转型升级的浴火重生后也将实现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凤凰涅槃<sup>[16]</sup>。政府应始终坚持引导者和培育者的战略定位,力促创业创新体制机制科学化,把握政策措施的重点方向和适宜力度,抓牢科技创新生态链构建这个牛鼻子,在大力提升科技成果转化中实现产品和产业向高端产业链和价值链的有效跨越<sup>[17]</sup>。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及由此衍生出来的相关产业既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经济发展新动能培育的重要内容和战略方向,同时也是传统产业涅槃重生和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利器。互联网与传统行业相结合催生的“互联网+”正推动经济形态和商业模式涅槃重生,大数据与 AI 乃至至于云计算的深度耦合正在构建从数据的获取到存储、再到分析挖掘,直至最终的可视化呈现与应用的完整数据生态体系。

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的经济体制改革以有效的市场机制、有活力的微观主体、适度的宏观调控为目标,以创新力和竞争力的提升为特征,以推动高质量的经济发展为根本旨归。与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和现

代化经济体系相匹配的宏观调控坚持间接引导为主、直接干预为辅,始终强调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坚持战略规划为主、政策介入为辅,始终强调更好激活市场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掌舵者”和“服务者”的作用;坚持固定规则为主、相机抉择为辅,始终强调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提高宏观调控的质量和效率。围绕“质量效益型发展、就业物价稳定、系统性风险有效控制和绿色生态发展”等基于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产生的新发展目标,国家应尽量从微观市场尤其是充分竞争的市场中抽身,更加聚焦国家战略和中长期规划等顶层制度设计,更加聚焦各类经济政策的优化与协同。

### 三、中国特色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

在经济新常态的现实环境和根本逻辑中,只有坚持新发展理念引领并将其贯穿于“质量、效率、动力”变革的全过程,才能有效应对三期叠加所带来的现实困难和挑战,才能在跨越三大关口的基础上推动高质量发展。新发展理念和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耦合,是理论先进性和实践可行性的辩证统一,理论因为有了对象承载而不再空洞,实践因为有了理论的指导而不再盲目。以五大发展理念为载体和抓手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为我们有效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认识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提供了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发展理念的引领和先导性作用,强调在“信息化→新动能→新发展→新辉煌”过程中更好适应我国发展新历史方位,实现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特征转换<sup>[18]</sup>。从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理想构建建立基于“自由人联合体”这一人本维度出发,强调解放、自由、公平、包容和幸福的共享发展无疑是马克思“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的重要内核。共享发展理念与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经济正义观一脉相承;与社会主义“使剥削和两极分化在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中逐步消亡,使共同富裕最终实现”的本质具有天然耦合性<sup>[19]</sup>。践行共享发展理念,首先要大力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按照广覆盖、多层次、保基本、可持续的原则构建具有底线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在需要与可能允执厥中的基础上实现和谐的共享发展;其次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国企改革不断深化,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全面实施负面清单制度,发挥市场和政府各自比较优势,在效率与公平的平衡中实现可持续的共享发展;三是要优化政府

激励、社会支持、劳动者就业创业的激励机制设计,在责任与权力的平衡中实现包容的共享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思想中,首次将创新上升到发展理念的高度,并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将其确立为五大发展理念之首,在党的十九大上将其确立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继而在2018年两会中进一步将其与发展、人才一体论述形成了“三个第一”的重要判断。习近平总书记的创新发展理念在内涵层面发展了一套由“理论、制度、科技、文化”等不同要素构筑的完整系统,并在国家发展全局中既突出了科技创新这一重点,又统筹兼顾到了其他创新要素。创新发展理念以人为本,强调人才是创新的根基,为此必须破除人才政策和科研成果转化方面存在的体制机制障碍。在“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逻辑演绎中,创新就像是一条大动脉,作为“第一资源”的人才要素,通过创新这一创造性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为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提供着不竭的“第一动力”。思想和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创新的思维、创新的能力、创新的模式、创新的举措起着战略性支撑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国家治理的全过程中,创新始终是贯穿全局的核心链条,抓发展谋未来应该紧紧围绕创新这一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聚力突破,这既是形势所逼,也是大势所趋,更是国运所系<sup>[20]</sup>。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9.58%的巨大成就堪称奇迹,其奥秘就在于对内改革的同时,以开放的理念和行动积极参与并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及价值链的分工、调整与重塑<sup>[21]</sup>。开放发展是科学的认识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只有深入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才能驱动全球普惠市场更大更开放,才能推动全球利益共享链条更强更紧密<sup>[22]</sup>。开放发展是辩证的方法论,高水平开放是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这一根本问题的内在要求,是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世界潮流,应对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国际经贸格局深刻变化、部分国家贸易霸凌主义抬头等外部挑战的情势使然。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贸易和货币体系下,中国对外开放整体水平不高,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处于微笑曲线的底部。这种以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端生产为特征的“打工仔”模式,使得中国的贸易和经济收益的获得付出了资源环境生态严重破坏、技术主权高度依赖外国、产业转型升级严重滞后等重大代价。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开放型经济强国背景下的高水平开放,是“观念、体制、格局”的全面解放与提升,我

们应在国内国际两个场域的联通中把握好内因与外因的辩证关系。一方面,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谋发展,积极争取全球范围内丰富的资金、技术、资源、市场、人才乃至机遇和理念。另一方面,坚持在立足中国并以我为主的基础上挖掘发挥中国比较优势,坚持核心技术自主攻关以抢占科技制高点,坚持产业链上下游有效延伸以整合全球价值链,坚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指引下优化国际经贸规则,构建包容互惠的全球经济增长新机制。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包含“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内的整体性需求。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指出,现代化经济体系所要实现的高质量发展目标必然要求以绿色发展为方向,这是从根本上解决污染问题的有效对策<sup>[23]</sup>,这一理念坚持唯物主义世界观,强调顺应自然、尊重规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sup>[24]</sup>。这一在实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绿色发展理念是对马克思人本主义的生态主义的继承与发扬,其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系列重要论断更是充满唯物辩证法智慧。习近平绿色发展理念具有“有机整体性、立体协调性、代际持续性”的系统特征,坚持了“自然优先、人民至上、和谐共生”的价值取向,构建了“国土绿色规划、社会绿色转型、人格绿色美化”的实践路径<sup>[25]</sup>。绿色发展是“生产、生活、生态”的和谐统一,然而,现实中盲目追求GDP的低质量增长模式导致了诸多环保问题。《2017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统计显示,我国239个城市空气质量超标,占比达到70.7%;出现酸雨城市的比例达到36.1%,酸雨频率为10.8%;全国地表水劣V类水体占比8.3%,31省223个地级市5100个监测点地下水水质监测较差和极差比例高达66.6%。此外,农药超标、化肥滥用在造成食品安全隐患的同时也带来了耕地板结、土壤酸化等严重的生态环保问题。作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治本之策的绿色发展要求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生产、生活中进行“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中遵循自然规律,避免过度攫取;在绿色循环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有效推动粗放型生产方式向集约型生产方式的质变,避免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高度重视科技进步,在产业化、规模化、集约化和科技化的有机统一中实现资源集约利用,污染物排放大幅减少,生态环境有效改良。

协调发展理念是对发展问题的哲学总结,独具历史意蕴和哲学意蕴。作为一种强调平衡的思想,中国古代农业社会时期“天人合一”“中庸之道”“兼容并包”等哲思中就已经开始了对协调发展理念的思考与探讨。作为一种蕴含着整体性和协调性的哲

学思维,马克思主义及以此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一贯强调协调发展。习近平强调,我们应该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城乡协调发展、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等4个方面坚持协调发展并着力形成平衡发展结构<sup>[3]</sup>。现实中,我国仍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二元化、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不够等问题。区域经济发展方面,2016年东部、中部和西部的GDP总量分别为45.60万亿、15.91万亿和15.65万亿,占比分别为59%、21%和20%。以人均可支配收入城乡居民差距这一反映城乡二元结构的指标为例,《中国统计年鉴》披露的城镇居民2017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64万元,是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4万元的2.72倍。而《中国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水平评估报告(2015)》披露的两化融合情况表明,我国2015年两化融合发展总指数为72.68,虽然相对以往而言有较大进步,但要赶上美国 and 德国分别实施的工业互联网和工业4.0水平的路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时,我国的两化融合还存在巨大区域差异,仍有15个省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如最低的西藏与最高的广东差距达到1倍以上。为此,我国已从国家战略层面进行了区域协调发展、乡村振兴、创新驱动发展等一系列重大的部署,致力于从根本上解决区域协调发展中的难点、痛点和堵点,在理顺关系、拓展空间、提升效能中破制约、补短板、缩差距,推动各区域统筹兼顾、均衡一体、协同并进发展。

#### 四、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到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进路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包括理论和实践两个部分。两大问题的回答使得理论和实践在有机结合、辩证统一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科学系统、逻辑严密的思想体系。如前所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逻辑目标明确、战略清晰,即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它主要回答了“是什么”的问题,但还需要回答一个“怎么办”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七个坚持”的主要内涵。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七个坚持”最重要<sup>[26]</sup>。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集中统一领导具有历史必然性。正确认识和处理党政关系,我们必须摆脱对西方主流理论的盲从,在“马魂、中体、西用”的辩证统一中脱离教条主义泥淖,从中国具体国情尤其是政治实践出发,在处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看待、分析和解决中国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sup>[1]</sup>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党的领导是基本方略。它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政分工为总体特征,中国共产党主要发挥领导和引导作用,人大主要发挥立法和监督作用,政府则主要发挥管理和执行的作用<sup>[27]</sup>。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包含经济工作在内且以其为中心的全面领导。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经济建设在党领导国家治理中的这一重要地位是由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和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两个没有变”的客观实际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我国经济工作的长期实践中,已形成中央政治局和地方各级党委定期或不定期召开相关会议研判经济形势、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审查重大事宜、部署经济工作、实施宏观调控在内的整体框架和流程体系,从而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达致“顺势、明道、优术”之臻境。

在“改革→创新→发展”的逐级驱动过程中,人民始终是贯穿全程最能动的主体性要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重要体现。马克思主义者坚信,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是物质财富、精神财富乃至社会历史的创造者<sup>[28]</sup>。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为我们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了价值标尺,确保我们不会陷入改旗易帜的迷途甚至邪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在习近平关于经济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中出现的频次极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任何一项重大改革,都要站在人民立场上把握和处理好涉及改革的重大问题,都要从人民利益出发谋划改革思路、制定改革举措。

统筹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从人民的角度看待、分析和处理改革攻坚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各项改革举措必须始终按照问题导向、科学谋划、狠抓落实、追求实效的原则推进<sup>[29]</sup>。也就是说,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求我们从老百姓最急、最忧、最怨的问题入手思考问题,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出发解决问题,实实在在地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存在感、幸福感。

除“党的领导”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之外的五个坚持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方法。实事求是和对立统一规律分别构成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核心内涵,与理论哲学不同的是,二者均

具有鲜明的实践特征。这就要求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中必须破除一切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始终坚持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认识、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实事求是的过程本质上就是我们发挥主观能动性,探索发现问题,并通过揭示规律、创新理论来指导我们解决问题的过程。一般来说,“实事”也即客观存在的事实有成绩和问题两类状态,如果连问题都没搞清楚,掌握规律、解决问题、推进实践发展就只能是空谈。因此,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往往是从现存问题的批判与反思开始。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从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特别是从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或者是主要矛盾出发,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我们才能在明确未来根本任务和中心工作的基础上更好地实施宏观调控。

站在改革开放 40 周年的今天,我们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的伟大成就,首先就在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政治上“以阶级斗争为纲”和经济上“全面推行计划经济”的系统性反思,从而在对社会主要矛盾正确判断的基础上将中国这艘巨轮重新拉回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道路上来。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出发,不断解放思想,探求客观经济规律,在否定资本主义的同时,创造性地去除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色彩,从而在“改革开放”的实践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提出在资源配置中引入市场这一重要手段,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在 1992 年党的十四大上将其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这从本质上打破了经济上的国家主义和政府万能模式。当然,由于思维定势和路径依赖,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结合是一个逐步发展和强化的过程。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一个变和两个没有变”的基本情况决定了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抓牢经济体制改革这个龙头和关键,在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优化平衡中实现核心环节的精准突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有机耦合,当然要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市场无形之手的基础和决定作用,实现商品、货币、资本效率的极大提升。但针对市场经济运行中垄断、负外部性、信息不完全等内在缺陷,甚至如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过度扩张后对人类、对社会的操控等问题,我们必须以社会主义之“道”来加以驾驭和控制。这就要求我们更好地发挥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从发展思路的确定、经济政策的制定、宏观调控的实施等方面单独或同时发力,确保“活经济,优服务,保公平,强监管,稳秩序,推发展,促共享”等目标的有机统一<sup>[30]</sup>。最后,工作策略如若不得当,工作方法如若不正确,可能会使得伟大的

战略因为战术执行方面的一系列错误而失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为推进高质量发展的一系列战略设计和政策制定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还只是基于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提出的目标和任务。只有通过方法和工具的创新,只有通过战术层面的优化执行,才能确保战略与战术、任务与方法、动机与效果的完美统一,否则我们就容易陷入毛泽东所说的“想过河却没桥或船、想治好病却把人治死”的悖论与困境。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N]. 人民日报, 2017-10-28 (001).
- [2] 习近平. 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 [N]. 人民日报, 2012-11-19 (002).
- [3] 习近平.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 [N]. 人民日报, 2015-11-04 (002).
- [4] 习近平. 主动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J]. 党的文献, 2017(4): 3-18.
- [5] 金碚. 关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研究 [J]. 中国工业经济, 2018(4): 5-18.
- [6] 本刊综合. 习近平总书记谈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 [J]. 人民周刊, 2018(2): 10-11.
- [7] 习近平.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6-05-10 (002).
- [8] 李志刚, 李晓萍, 江飞涛. 收入分配与产品质量前沿 [J]. 中国工业经济, 2018(1): 24-40.
- [9] 习近平. 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4-06-10 (002).
- [10] 李思龙, 郭丽虹. 市场依赖度、资本错配与全要素生产率 [J]. 产业经济研究, 2018(2): 103-115.
- [11] 杨德才, 靳振忠, 蒋辛未. 制度效率、制度僵化与王朝周期性兴衰——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分析 [J].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16, 18(5): 27-39.
- [12] 习近平. 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8-06-14 (002).
- [13] 谢浩, 张明之. 关于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国内研究综述 [J]. 南京财经大学学报, 2013(5): 33-38.
- [14] 习近平. 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8-05-29 (002).
- [15]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产业升级报告》联合课题组. 依托产业升级 创

- 造新的比较优势[J].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13(5): 81-84.
- [16] 刘满凤,李昕耀.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互动发展的计量验证——基于生产函数角度[J].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7(4):14-23.
- [17] 习近平. 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奋斗[N]. 人民日报, 2016-06-01(002).
- [18] 习近平. 习近平致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贺信[J].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18(5):11-12.
- [19] 王洪斌,刘吉昌. 共享发展理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耦合与实现路径[J].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0(1):3-9.
- [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M]. 北京:中共文献出版社, 2016.
- [21] 程承坪,胡姜. 中国经济奇迹探析——写在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J]. 河北学刊,2018,38(3):129-141.
- [22] 习近平. 抓住世界经济转型机遇 谋求亚太更大发展[N]. 人民日报,2017-11-11(002).
- [23] 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J]. 党建,2018(6):4-6.
- [24] 向海英. 习近平绿色发展理念的哲学基础[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6):176-180.
- [25] 刘金,曹康康,黄志斌. 绿色发展的系统特征、价值取向以及实践路径论要[J]. 学术界,2018(5):206-213.
- [26] 吴秋余. 推动高质量发展,“七个坚持”最重要[N]. 人民日报,2017-12-21(002).
- [27] 张荣臣. 准确把握“党政分工”概念[N]. 北京日报, 2017-04-10(014).
- [28] 郭广银. 习近平关于人民主体地位的思想[J].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4,18(5):19-22.
- [29] 习近平. 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J]. 求是,2014(1):3-6.
- [30] 习近平.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N]. 人民日报, 2013-11-16(001).

(责任编辑:高虹)

##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订阅办法

(CN 32-1521/C, ISSN 1671-4970, 双月刊, 自办发行)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由河海大学主办,每逢双月末出版,国内外公开发行。每期定价:11元(含邮费),全年订费66元。欢迎广大读者和单位函索订单或直接汇款订阅。

订阅办法:

(1) 邮局汇款:请将订单和邮签与汇款单仔细填好后寄回本刊编辑部,汇款时务请注明“订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未收到订单者亦可向编辑部函索订单。

(2) 银行汇款:银行汇款:中国工商银行南京宁海路分理处4301011409001024513,河海大学《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

联系地址:210098 南京市西康路1号《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